

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

敏春芳 肖雁云

【摘要】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是当前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梳理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研究现状发现,已有研究成果着眼于语言接触产生的词汇借用现象、语言接触过程的语法复制以及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研究形式多样,成果层出不穷。但也存在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等问题。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不仅为汉语方言提供了语言接触研究的新视角,也为接触语言学提供了中国北方汉语和阿尔泰语言接触的研究个案,修正并完善了语言接触理论。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能够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北地区;语言接触;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语方言;借词

【作者简介】敏春芳,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汉语史与汉语接触研究;肖雁云,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97~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回族话与回族经堂语、小儿经语言研究”(17ZDA31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语言接触的前沿地带。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长期交往和交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语言接触。“语言接触”是指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方言在一定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它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不仅反映了语言变化的过程,还在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较早系统研究语言接触问题始于魏因赖希(Weinreich)的著作《接触中的语言:现象分析与难题化解》(*Language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随之“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被正式提出并广泛使用,随后托马森(Thomason)、考夫曼(Kaufman)、艾娜·豪根(Einar Haugen)等国外学者对语言接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相较于国外研究起步较晚,但是方兴未艾,著述颇丰,如戴庆厦、孙宏开、陈保亚、吴安其、吴福祥、李云兵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在外部因素(人口迁徙、语言接触、遗传等)和内部因素(语言内部结构)的共同影响下,语言经过不断演变,形成现在的语言形式,语言演变过程中语言接触对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国是当今世界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征,造就了中国人与生俱来又花样繁复的语言生态。中国境内有包括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在内的130余种语言,西北民族地区同时并存着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甘青地区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有东乡语、保安语、撒拉语、土族语等。其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等民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而撒拉语则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甘肃、青海境内使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此外,甘肃东乡县的唐汪话和青海同仁县的五屯话属于混合型语言。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对北方方言进行分类: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为晋语,其他地区方言为官话。官话方言按其地理位置自北向南可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兰银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八种。本文所述西北地区汉语方言,指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方言。西北五省的方言可分为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晋语、西南官话等四种次方言。立足于西北地区语言接

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从研究现状、问题剖析和问题对策等方面出发,探索并勾勒西北地区语言接触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其研究广泛聚焦于西南、华南和东北地区,研究内容大致从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以接触方言的性质为核心,探究接触的进展与程度问题;分析研究接触方言的必要性,着重比较接触方言的语法特征,并结合历史和民族人口状况判定接触语言的性质。二是以接触方言的具体语法现象为研究对象,考察接触方言的词法、形态标记和语序类型等语法现象,并探讨上述语法现象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三是从语言类型学视角出发,追溯接触方言中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并提出研究接触方言的建议。

由于西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多民族聚居的人文社会环境,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将目光转向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使得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成为汉语方言学和民族语言学关注的重点,同时涌现出一系列关于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分别从语言接触导致的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对民族语言、民族语言对西北汉语方言等带来的不同形式的影响,以及西北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三方面探讨了西北语言接触的基本主题。

(一)西北地区语言中的词汇借用现象研究

不同语系、语族的语言使用者在相互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无论是发生个体接触还是群体接触,最终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词汇借用,因为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最易变化、最具渗透性的要素。“借词”在汉语中也叫“外来词”“借入语”“借用语”等,关于“借词”的定义和种类,各家说法不一,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把其他语言中词的音义都带过来的,叫借词;利用汉语原有的构词方式把其他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引入到汉语中的,叫译词^[1]。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词义源自外族语某词的基础上,在语音形式上借自相对应的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汉语词,还应具备在汉语中长时间使用的条件,才被称作纯正的外来词^[2]。第三种观点主张外来词是源于外语影响后产生的词,不是外语中原来的词,这部分词要有一个在原来外语词的基础上经过改造和重新创制的过程^[3]。

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关于“借词”的定义集各家之所长,全面对“借词”进行了定位,普遍为学术界认可,因此本文采用其观点分析西北地区语言中的“借词”。西北地区关于词汇借用现象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般词汇的借用,二是功能词的借用。

1. 一般词汇的借用

一般词汇借用的范围比较广,包括一般物品、动植物名称、官职、部落头衔等文化词汇。

(1) 词汇借用的表现形式

西北地区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语言发生接触,这些接触主要体现在国家通用语言借词、汉语方言借词以及周边民族语言的借词上。在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过程中,并存两种机制,即“母语干扰”和“借用”。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使用者从汉语(或其他语言)借入大量的词汇,在借用的整个过程中,起作用的主要机制是语码转换^[4]。

A.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的“保安语”

保安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与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接触类型属于跨地缘文化性接触,这种接触强度不高,且多借文化性词语。积石山保安语的借词系统符合语言接触中普遍存在的借贷等级^[5]。在保安语的借词中,既有全借型,也有半借型,如表1。

表1 保安语部分借词表

全借型			半借型								
借音			半音译半意译				音译加注				
语义	民语	汉语	语义	民语	保安语成分	汉语成分	语义	民语	保安语成分	汉语成分	
马甲	tɕiatɕia	夹夹	皮鞋	arʂuŋ	hai	arʂuŋ	hai	生铁	ʂəŋtɕiətəmər	təmər	ʂəŋtɕiə
朋友	lianʂou	连手	鼻梁	χorlianʂianʂ	χor	liangliang	瓦房	uafaŋ	gər	gər	uafaŋ
面条	tʂaŋfan	长饭	土堆	ɕiru duəi duəi	ɕiru	duəi duəi	捷路	tʂəilu mər	mər	tʂəilu	

B.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的“唐汪话”

唐汪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的一个镇,镇上有唐、汪二姓,元明之际汉族人先后迁入该地。据马鹤天记载,唐姓原籍四川柳树庄;汪姓始于何时不可考,但在唐姓之后。因户口渐多,遂改名唐汪川^[615]。他们的语言底层是汉语,同时受到了东乡语的影响。由于政治经济、移民迁徙等因素的影响,唐汪话成为一种混合型语言。在唐汪话的词汇中,大多数借自汉语词,也有少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东乡语借词^[7],见表2。

表2 “唐汪话”的借词表现形式^{[81]159-162}

语义	唐汪话	东乡语	语义	唐汪话	其他语言
汉民	nã ²² ka ⁴⁴²	naŋca	妈妈	a ²² na ²⁴²	ana(突厥语)
孤儿	və ²² lie ²² tʂhə ⁴⁴²	oliətʂin	上帝	xu ²² ta ⁴⁴²	χuda(波斯语)
口袋	tʂhəu ⁴ tʂhəu ⁴⁴²	tʂəutʂəu	天空	asmaŋ.ɪ	asimaŋ(波斯语)
吝啬	s ¹ tʂhia ²² pshɪ ⁴⁴²	tʂhiapigui	世界	tu ²² ja ⁴⁴²	duja(阿拉伯语)
虐待	tʂa ²² ja ⁴⁴²	dʒajala	智慧	a ²² kɪe ²² ɪ ²⁴	'əɟuli(阿拉伯语)
蜘蛛	tʂəu ²² tʂəu ⁴²	dʒəudzəu	祈祷	tu ²² va ⁴⁴²	duwa(阿拉伯语)
窍门	χa ⁴⁴ ʂu ⁴²	'χaʂu	魔怪	zɪ ⁴⁴ pu ²² ɪ ²⁴ sɪ ⁴²	ibi'lisi(阿拉伯语)

C.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的“五屯话”

五屯话是受藏语影响较大的混合语,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分布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境内。大部分五屯人是双重语言者,自身讲五屯话,与周围的藏族、回族以及部分懂藏语的汉族则讲藏语,因此五屯话受到藏语的影响较大,其借词中既有藏语词,也有汉语词,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见表3。

表3 “五屯话”与藏语、汉语的接触词汇^[9]

语义	五屯话	藏语	语义	五屯话	汉语
寡妇	jusa	gyug sa	园子	janʂɪ	wuai ³⁵ ʂɪ ²¹⁴
光	ə	ol	椅子	ji'tʂɪ	zɕi ²¹⁴ ʂɪ ²¹⁴
空气	k'a'wɣ	k'awək	吹	p'æ	pai ³⁵
夏天	dbyar kha	jark'a	雹子(雪疙瘩)	sɪeka'ta	ɕue ²¹⁴ kə ³³ ta ³³
额头	thog pa	t'hpə	葱(翠芽)	tʂ'uija	tʂhui ⁵¹ ja ³⁵
戒指	mdzub skjid	tʂɕtɕi	河岸(河边)	'xəpia	xə ³⁵ pie ⁵⁵
壁	wə'tɕ'ə	wartɕon	蚂蚁	'majəŋ	ma ³⁵ zɪ ²¹⁴

(2)借词的源流考证

考证民族语言中借词的来源,对于理解借词的含义、词形的演变和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的研究中,关注较多的是甘青地区东乡语词汇借贷的历史层次问题。东乡语在与汉语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词,借贷了大量汉语词汇^[10],这些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较为分明,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11]。根据东乡语的构词基础可以看出,突厥语有可能是当时东乡族祖先这一群体使用的

通用语,岁月留痕,波斯语—阿拉伯语涉及的词汇主要局限在宗教和文化领域,后期融入的可能性较大^[11]。

对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西部裕固语主要从汉语中借用词汇,其次是蒙语和藏语;而维吾尔语主要从阿拉伯语、波斯语中借用词汇,其次是俄语^[12]。关于维吾尔语的源流问题,有学者对维吾尔语的借词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波斯语借词基本来源于新波斯语,而古维吾尔语中的波斯语借词既有来源于波斯语的,也有来源于伊朗语的。后一类借词中的部分词汇在今天的维吾尔语中保存了下来,但有些词已被弃用^[13]。

2. 功能词的借用

语言接触中,虚词通常是很难借用的^[14]。一般而言,当语言进入到深度接触阶段以后,虚词借用的情况才有可能出现。西北地区语言接触中功能词的借用一般表现为语言系统中某些固定的虚词,会在其他语言体系中通过借用的方式来使用,从而使得原有语言体系和新的语言体系中存在的虚词同时共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弥补和相互竞争的特征。借用而来的虚词的意义同固有词保持一致,两者在语言系统中并存并用,在语言使用环境和语义表达中并未存在什么特殊之处^[15]^[93]。民族语向汉语借入的词汇不仅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甚至还有名词复数标记、构词词缀等功能词。东乡语中固有的复数标记是“-la”,同时从汉语中借入复数标记“-ciə”。东乡语的判断句中也会借用汉语系词“是”表示判断,形成汉语系词“是”和原有表判断的助动词“wo”前后照应的格式。西北地区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诸语族语言不断向汉语中借入大量虚词,汉借虚词的出现使得各民族语的句法结构出现了异源性语言成分。在东乡语中,由于大量使用汉借虚词,从而使得东乡语有了从后置词语言转变为前置词语言的倾向^[15]^[17]。

(二) 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语法相互影响

西北地区的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不少语法变异现象。语言演变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内部自身的发展演变,二是与外部语言接触后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后对语法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或渗透其语法手段或语言结构,从而改变或打破原语言固有的规则,使其语言的内部系统和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16]。西北地区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在长期接触过程中产生的语法变化主要体现为语序类型和语法范畴的变化。

1. 语序类型

汉语自身缺乏形态变化的特征,依赖语序的调整作为其语法表达手段。语言接触过程会引发语序类型改变,主要表现在基本语序借用和改变原有基本语序两个方面。现有文献从三个方面描写并分析了西北地区语序类型问题:一是SOV型语序类型,二是介词类型,三是比较句的语序类型。

(1) SOV型语序类型

Joseph H. Greenberg将世界语言根据主语(S)、谓语(V)、宾语(O)作为语序参项划分成六种语言形式,其中最突出的三种类型有SVO、VSO和SOV。在后续学者的研究过程中,又以Greenberg语序分类为基础对OV和VO语序原型对应参项的语序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到了这两种语言类型的基本特征,为汉语语序类型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动词和宾语之间的语序是非常重要的语法类型参项,其重要性在于语序所蕴含的一系列相关的语法变量^[17]。汉语的小句结构一直以SVO为基本语序类型,西北境内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的基本语序类型为SOV型。在西北地区,汉语方言与周边民族语言的长期接触导致了汉语方言语序类型受到SOV型语言的影响。

汉语方言河州话的语序类型受到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河州话中SOV型句法模式是其区别于其他汉语方言最主要的特点,关于其来源,学界均认为河州话是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结果。具

体受到哪种语言的影响,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现有文献中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坚持河州话中SOV语序的形成与阿尔泰语的影响不无关系,是阿尔泰语影响下的产物,东乡语和河州话都是SOV型语序,后者深受前者的影响,河州话的句法结构语序和东乡语几乎是完全平行的^[17]。另一类则认为SOV句式实际上是阿尔泰语与河州话接触后形成的产物,同时可能与藏语的影响有关^[18]。从语言形式上来看,阿尔泰语系与汉藏语系皆归入SOV型语言,但两种语言体系与汉语在历史上的接触时间有先后之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河州话中SOV型语序与藏缅语和阿尔泰语均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前者表现在发生学层面,而后者表现在类型学层面^[19]。有研究指出,相比于藏语成分,阿尔泰语对河州话语言系统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以将其按照等级强弱程度(由强到弱)排列:蒙古语、突厥语、藏语^[20]。

(2)介词类型

现代汉语体系中,根据介词的分布类型可以看出汉语实际上是前置、后置词共存的一种语言体系。前置词多来自于动词,而后置词多来自于名词。在不同现代汉语方言中,其介词类型表现各不相同。部分北方方言前置词较为发达,温州话、义乌话等吴方言的后置词发达。西北地区的西宁话、甘沟话、天祝话、临夏话、河州话等汉语方言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且后置词发达^[21-23]。

西宁、甘沟、天祝等地方言中的前置词数量最多,但在表达习惯和使用频率上,后置词更为发达,较为发达的后置词有“哈”“俩”“搭”“塔拉”等,这些后置词与甘青境内的阿尔泰语系诸语族的语法范畴十分相似^[24]。普通话中的一些前置词、框式介词在西宁话和天祝话中都以后置词的形式出现。SOV型语言的一个突出表现特征在于大量使用后置词,彰显了小句语序与介词类型之间的相关性^[24-25]。

(3)比较句

比较句是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语序类型中所提到比较句通常指差比句。OV型语言的差比句更多使用“比较基准+比较标记+比较结果”语序,VO型语言则更倾向于“比较结果+比较标记+比较基准”语序。西北地区的差比句研究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差比句的结构类型,二是差比句的结构来源。

A.差比句的结构类型

西宁汉语方言和临夏汉语方言的基本语序都为SOV型,与周边的藏语、东乡语、土族语的基本语序相吻合。西宁汉语方言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差比结构的语序为“比较主体+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其中“哈”作为比较标记,附加在比较基准之后,有时“哈”在语流中会弱化为“啊”,如:

例1:家的工资我哈高哈着。(他的工资比我的高。)^[26]

例2:这个娃娃长着快啊,哥哥哈大哈着。(这个孩子长得真快,都比哥哥高了。)^[26]

例3:今年冬天啊年时啊冷者。(今年冬天比去年冷。)^{[27][240]}

临夏汉语方言的特色差比结构与西宁汉语方言相同,使用“比较主体+基准+哈+形容词”结构,不同的是,西宁话中的比较标记习惯使用附置词“啊”,而临夏话更倾向于“哈”^{[27][240]}。

B.差比句结构的来源

关于西宁话和临夏话差比句“比较主体+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结构的来源,目前学界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比较主体+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是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土族语的影响下产生的^[28]。李蓝赞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比较主体+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结构中的比较标记“哈”可能有两种来源,或源于蒙古语的离比格标记[-aar],或源于土族语的[sa]^[29]。第二种倾向于“比较主体+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这一差比结构更多受到安多藏语的影响,甚至土族语和保安语中的这一结构也可能是受到藏语的影响^{[26][245]}。

2. 语法范畴

汉语是一种典型的孤立语,主要依靠词序和虚词来表达词汇之间的关系和其他语法意义。西北境内的阿尔泰语系内部各语言具有典型的黏着型语言特征,通常黏合多个附加成分以表示多重语法意义。

通过分析语言接触过程可以发现,孤立语与黏着语进行接触时,二者在不同程度上均出现语法范畴层面的变异[30],这种变异一是表现为黏着语对孤立语的影响,二是表现为孤立语对黏着语的影响。藏缅语与阿尔泰语等黏着型语言对孤立语言的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孤立语中的部分汉语方言在词干后添加后缀,而产生数、格、式之类的新型语法范畴^[31-33]。作为孤立语的西北汉语方言对阿尔泰语等黏着型语言的影响表现为黏着语的语法范畴出现省略、替代、简化、异化、类化现象。

(三) 语言接触理论研究

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疆语言接触的机制以及接触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关系等方面。

1. 语言接触的机制和规律

关于语言接触的机制和规律,研究成果更多集中在新疆的语言中。新疆语言接触的圈层规律是指在语言接触中,由于结构相似和功能差异而形成语言圈层;汉语一直是接触的中心,影响着外圈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根据语言传播的波浪特点,同样会受到影响语言的反作用^[34]。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比较汉语、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对新疆民汉语言独特的五个圈层规律进行了总结分析:第一,语言为层级结构,构成的语言集团呈现出阶梯分布的特征;第二,语言以祖语为基础和核心,而语言集团则以优势语言为核心;第三,语言的主要形成方式为混合—推移式,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特征;第四,语言集团相互作用,语言体系存在相关性;第五,语言表现出明显的类聚性特征,不同类型的语言通过凝聚的方式形成新的群体^[35]。

2. 运用接触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的研究

在讨论阿尔泰语系语言时,王远新强调要紧紧密结合阿尔泰民族、文化及整个语言发展的历史,深入研究各族语言中数词的演变历程,并利用其研究成果为建立发展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服务。在进行历史比较时,应拓宽研究的范围,可以借鉴类型学或比较文化学的材料与方法来丰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36]。

以上对于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研究成果重视西北地区不同语言间的接触、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接触以及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研究成果呈现增长趋势,除了语言接触理论,学者们还结合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理论分析解释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现象,为今后西北地区乃至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可行的路径。

二、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问题剖析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系统梳理能够发现,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既存在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汉语方言而发生的语法变异情况,同时也存在汉语方言影响民族语言而导致民族语言的变异情况。学者们对于西北地区语言接触中的词汇借用现象和语序类型的研究较为深入,语言接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整体上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忽视内部差异与外部差异的比较研究,缺乏系统性

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甘青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分布着操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各民族,是语言接触的走廊。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和汉藏语系诸语族语言内部存在较大差异。目前西北地区语言接触已有的研究成果囿于复杂语言现象或区域性语言特征的调查与描写分析,与内部差异比较相关联的部分更多体现在同语族或同地区语言内部比较,很少涉及跨语族或跨地区的外部比较。比较研究既包括同一语族、同一语系之间不同语言的全面比较,也包括不同语族、不同语系之间的某一范畴、某一形式或某一语法要素之间的比较。

在现有文献中,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和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在内部和外部差异的相互比较,缺乏与境内印欧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等诸语系的比较研究。此外,应重视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语言与外部其他语言的横向比较研究,通过与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系语言的外部比较,厘清造成西北地区语言接触中特殊词汇、语法现象形成的具体原因、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就外部差异比较而言,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等语言与临夏话、西宁话、唐汪话等汉语方言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这种比较仅限于共时比较,历史比较研究则较少开展。现有的关于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语方言之间的探讨基于历史人文背景的共时关联特征,很少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着眼,有待进一步补充。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之间的关联特征所体现的纵向源流关系、历史移民带来的横向渗透关系、与通语之间的关系等都应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各项关联特征究竟是属于哪种类型,是共同保留、共同脱轨、共同创新还是平行创新?这些都是西北语言接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前三种形式通常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中经常使用,是探讨语言关系的三类重要参考指标,后一种特征难以反映方言间存在的历史关系。

除此以外,开展语言比较研究建立在对各地语言充分调查的基础之上。现有研究成果侧重于语言描述,涉及的方言点尚不均衡,调查范式不够科学。各市、县方言研究多,乡镇语言研究少,此种调查范式不利于大范围语言差异的比较研究。汉语方言的调查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首要任务,西北地区民族语言的调查也是如此,在调查描写的基础上,应扩大调查的范围。

(二)研究内容较为单一,难以真正揭示语言接触研究的深层机制

西北地区一直是多民族聚居杂处、共同发展的区域,随着学校教育的不断发展,西北地区使用双语人数逐渐增多,语言接触活动更加频繁,由此产生的语言借用现象普遍而又复杂,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语言完全可能对西北地区的汉语方言语音系统产生影响。甘青一带汉语方言多为三个声调,近年来还发现了两个声调的方言,在汉语方言中是独树一帜的。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南方汉语的声调数普遍较多,一些南方汉语方言有七八个声调,东北至陕西关中一带的汉语方言基本是四个声调。汉语方言声调数目从南向北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由于西北地区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和汉藏语系的藏语都是无声调语言,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北汉语方言中声调逐渐减少甚至消失的情况或许是受到当地和周边无声调语言的影响,当是语言接触后产生的现象。但是,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声调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程度、影响的层面、具体的影响方式、内在动机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如前所述,在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中,主要表现在词汇的借用和语序类型的研究上。在借词的研究中,外来借词在进入民族语言体系时都要经历一个民族语言化过程,即借词语音、语义、构词方式等在一段时间内都要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以适应其语言体系。总体来看,已有成果主要停留在研究借词的类型、特点、类别、借入方式、借入渠道等,对于借词的来源和历史层次问题的关注较少。民族语言的借词研究多是选取一些汉语借词来分析其进入民族语言后的表现形式和借入方式等,而缺乏对于外来借词内在机制的深入研究。在现有文献中,一些汉语借词进入民族语后成为了活跃的语素,有的词却被弃用。目前的研究多侧重于对这一现象进行平面的客观描述,且多是从外部因素探讨这部分汉语借词消亡的原因,并未从语言自身发展演变的内部因素探讨其消亡的深层原因。更缺乏对借词来源和历史层次问题的探讨。这类借词的深层特点是什么,其来源和历史借贷层次又是怎样的?鲜有学者对此类问题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民族语言外来借词的研究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三)强调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研究,对语言的互动研究不够

语言接触对语言的影响是一个历时动态过程,语言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既有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汉语方言而发生的语法变异情况,

也有汉语方言影响民族语言而导致民族语言变异的情况,但现有研究更多集中在由汉语及汉语方言引发的语言接触现象,即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忽略了弱势语言(民族语言)对汉语造成的影响,这使得许多特殊现象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东乡语、保安语的母语使用者,将母语的格标记“-da/ta”“-la”“-sə”对译成了相应的汉语词汇“搭/塔”“啦”“些”,因此,“搭/塔”“啦”“些”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选用的不同用字。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接触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处于持续发展变化的状态,其他语言会在与汉语接触的过程中相互不停协商和自我修正,最终实现两者区域性的趋同。

(四)研究视野较狭窄,跨学科与语言接触研究比较薄弱

西北多民族聚居的语言是其民族特征的重要表现。语言构成了民族特征的重要部分之后,便会融入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当中,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从已有文献来看,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倾向于语言本体的研究,缺乏跨学科研究的视角和思维。语言接触的跨学科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打破旧有的语言学界限,与其他学科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西北地区的语言研究来看,一方面应加强语言接触与考古学、历史学、分子人类学等领域的跨学科合作,仅从语言本体出发研究语言接触现象,没有考古学提供的时空框架和物证,没有历史学提供的历史事件的线索^[37],没有分子人类学提供的基因序列,我们难以厘清西北地区语言演变的脉络和走向。另一方面要加强语言接触与计算机科学技术、数据库技术相结合的研究,强化语言调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语言教育与语言服务、语言扶贫等领域的效应。

三、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的问题对策

综合分析当前语言接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应在覆盖领域、理论视角、人才队伍建设、语言数据库建设等方面更上一层楼。

(一)整合跨学科力量,拓宽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研究视角

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需要利用好“三把钥匙”,要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视野,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贯通,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因为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往往难以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理论的建构,传统的“两重证据法”强调地上的新材料与地下的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等出土材料之间的互证。而在实际研究中,“两重证据法”的相关分析理念已悄然完成了向“三重证据法”的顺利过渡,在前者基础上,又增加了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互证部分。方言是照射各地社会文化、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历史语言的活化石,能弥补古代文献之不足。我们对于民族语言(尤其是西北地区)开展的接触研究,应更加侧重于民族社会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三者之间的融合贯通与交叉联系,它们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三把钥匙”。历史比较语言学以语言谱系树作为标准判断语言体系之间的接触或亲属关系。民族社会学则注重对使用某类语言的人群的形成问题展开探讨。分子人类学是生命遗传学中的一个分支,同语言分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判定个体和群体使用的语言形式将其划分为不同群体并进行分辨考察。这主要是指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DNA和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目前关于东乡族的族源众说纷纭,有学者从群体遗传动态的角度探讨东乡族的族源,通过血样分析,可以推测出东乡族的起源同中亚色目人外迁存在密切关联,同蒙古族之间联系的可能性不大^[38]。历史比较语言学、民族社会学和分子人类学三者互相推求,一些复杂问题便如同拨云见日,水落石出。西北地区语言接触跨学科研究将日益成为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难题,尤其是成为复杂性、综合性和交融性的重大问题不可或缺的研究范式。因此,要牢牢把握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动态,将语言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实现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

(二)加强高质量语言学专业素养人才队伍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的群体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一是以培养调查研究民族文字、语言为职责的研究人员,这类群体通常都经过系统性的现代语言学训练,而且在西北地区各省市县进行过实地田野考察,具有良好的语言学功底和实地田野调查的能力;二是致力于研究民族学的当地学者(或是本土学者),这

类群体能够熟练掌握相关语言,具备一定的语言学理论知识,还对其民族的人文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众所周知,语言研究者一方面要具备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当地土著语言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然而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却出现了两种困境:一是研究民族语言的学者并非以该语言作为自己的母语,尽管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现代语言学知识,具备扎实的语言学理论功底,但由于无法流利表达,在调查研究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沟通障碍。二是一些会讲民族语言的学者对其母语研究有一定的造诣,但并未受过系统的语言学训练,缺乏语言学理论基础。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向我国重大战略需求,对于民族地区语言接触的研究有着更高的要求:民族语言研究者除了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外,还需要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加强“民—汉”型、“汉—民”型、“民—民”型等高质量语言学专业素养人才队伍建设,是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的当务之急。

(三)建立西北地区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数据库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逐渐兴起,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保存了大量语料。但客观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学者们调查时体例不一、详略不同、个别语料难以获取等诸方面的原因,使得语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学者们仅依靠有限的语料开展研究工作,一方面其研究视野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其结论的科学性、可靠性和真实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就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的现状而言,需要全方位将国内外学者们调查到的语音、词汇、语法、长篇语料等进行整理、汇总,并针对语料较少的语言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和搜集,而后利用多媒体技术将语料进行数字化处理。旨在为西北地区语言研究提供一个共享资源、信息的平台,帮助相关研究人员缩减语料调查和整理的工作量,让研究人员能够将研究重心放在语言事实的对比分析中。除此以外,数据库还能利用计算机进行相关的运算与分析,形成智能化运算结果,有助于为当地语言的借词来源以及所属历史层次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建立西北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数据库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涉及数据库设计、语料采集、标注、索引以及调查工具的选取和调查语料的录入等内容,工作繁琐且复杂,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高素质、高质量语言研究者的培养。

(四)加强民族语言方言地图的绘制

从全国范围来看,相比西南、华南和东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西北语言接触研究更多集中在语言事实的陈述、描摹与对比分析,诸如地理语言学领域的分析还比较少。在后续的语言接触研究中,可以根据自身研究需要选定特定数量的语音、词汇调查条目,在一个区域内布置多个方言点,深入各个乡镇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一手语料并利用地理语言学的优势将其绘制成图进行标注,从而更好地呈现出语言特征和民族方言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更加直观、科学地对特定地理区域语言接触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以揭示语言接触出现内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全面梳理语言历史发展进程。

(五)深化综合比较研究,提升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水平

西北地区具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接触频率高、时间长、范围广,呈现出不同层次的互动接触。既有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晋语和西南官话等汉语方言,也有藏语、东乡语、保安语、蒙古语等汉藏语系语言和阿尔泰语系诸语言。西北地区丰富的语言和接触关系为语言接触研究和语言演变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土壤。

目前,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多集中于借词和语法研究,而很少围绕语音展开研究。语言系统的研究离不开对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的研究。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应结合这三方面进行系统的考察,并深入微观层面分析语料,探究接触的机制。语言、方言接触会促成方言的演变,因此需要加强实证性研究。在进行纵、横两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将地理上的语言接触和历史上的移民运动结合起来,论证西北地区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现实关联和历史联系,是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未来可期的重要研究方向,这不仅可以为

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方案,还能极大地提高语言接触整体研究水平,从而使人们进一步加深对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认识。

(六)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来看,东西直线距离3700多千米,各地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差异较大,各语言主体在交流中难以实现无障碍沟通。这种障碍不仅存在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同样存在于不同地域的汉族之间。沟通上的障碍不仅影响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影响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对于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应认识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既要学好民族语言,还要掌握国家通用语言,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掌握更加先进的科学知识,更好地融入社会。”^[39]汉族民众更应当加强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将其当作与少数民族群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汉语在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自然会增加通用语言词汇的使用频率,有助于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整个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并非放弃民族语言,而是发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在沟通交流中的互补功能,实现民族成员之间的互融互通。搭建语言沟通的桥梁,一方面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另一方面要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学习其语言文字,在学习交流中增进感情、增加理解、建立友谊,真正发挥语言接触在沟通情感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广国家通用语、发展民族语,携手各民族成员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为语言接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使得当地的语言状况纵横交错。近年来,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研究发展迅速,其研究成果不仅为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语料,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理论。学无止境,研也无止境,语言接触研究的视角、研究范围以及深度、广度都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加深,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还应加强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特别是在“双一流”建设中,既要瞄准国内外学术前沿,引领学科发展,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又要注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做好西部文章。切实发挥西北的区域优势,凝练交叉学科特色,促进学科多元融合发展,探求科研内容新的学术生长点;加强在少数民族地区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3]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 [4]敏春芳,宋珊.语言接触中的干扰和转用——以东乡语“ciə”和东乡汉语的“些”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139-149.
- [5]敏春芳,杜冰心,刘星.积石山保安语的汉语借词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20(4):185-194.
- [6]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7]阿·伊布拉黑麦.甘肃境内唐汪话记略.民族语文,1985(6):33-47.
- [8]徐丹.唐汪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 [9]张成,董振邦.论语言接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22(1):42-76.
- [10]敏春芳.东乡语汉语借词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2012(15):157-173.
- [11]徐丹.甘青一带语言借贷的历史层次及模式.民族语文,2018(6):3-21.
- [12]陈宗振.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语言研究,1985(1):206-214.
- [13]木再帕尔.维吾尔语的语音扩展和语义销蚀.民族语文,2018(3):3-12.

- [14]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语言科学,2005(4):3-10.
- [15]包萨仁.蒙古语族东乡语与汉语的接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 [16]朱红.发展中的国内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16(1):42-44.
- [17]黄行.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民族语文,2005(3):7-13.
- [18]贾晞儒.对河湟汉语几个语法现象的分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4):37-44.
- [19]雒鹏.河州话语法——语言接触的结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30-32.
- [20]莫超.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汉语河州话研究综述.中国方言学报,2017(7):182-191.
- [21]杨永龙.青海民和甘沟话的语序类型.民族语文,2015(6):15-30.
- [22]安丽卿.论临夏话中的后置介词.贵州民族研究,2015(10):206-209.
- [23]宋珊.甘肃天祝县(华藏寺镇)汉语方言参考语法.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 [24]马梦玲.西宁方言中与语序有关的附置词及其类型学特点.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5):121-124.
- [25]王双成.西宁方言的介词类型.中国语文,2012(5):469-478,480.
- [26]王双成.西宁方言的差比句.中国语文,2009(3):241-247,288.
- [27]安丽卿.西宁市城东话语法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 [28]贾晞儒.从青海汉语的几个方言词看语言间的接触影响.民族语文,1994(4):57-63.
- [29]李蓝.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方言,2003(3):214-232.
- [30]吕军伟.接触视野下汉藏语系语言语法变异研究:现状、问题及建议.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0(2):12-19.
- [31]仁增旺姆.汉语河州话与藏语的句子结构比较.民族语文,1991(1):12-18.
- [32]李克郁.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民族语文,1987(3):27-31.
- [33]马树钧.汉语河州话与阿尔泰语言.民族语文,1984(2):50-55.
- [34]洪勇明.论语言影响的若干规律——以新疆语言接触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31-136.
- [35]王莉.基于文化圈理论的语言圈层问题初探.新疆社会科学,2008(6):103-106.
- [36]王远新.突厥语族语言的数词与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西北民族研究,1992(2):243-250,34.
- [37]徐丹.从跨学科视角研究中国北方汉语及民族语言.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1-04(3).
- [38]谢小冬.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2(1):35-39,107-108.
- [39]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09-28(2).

Language Contact Research in Northwest China: The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Min Chunfang Xiao Yanyun

Abstract: Language contact research in Northwest China is a hot and difficult topic in the current linguistic studies. By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studies on language contact in Northwest China, the present paper finds that many studies focus on language contact phenomena like lexical borrowing and grammatical replication as well as language contact theories in various forms and have got prolific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exists insufficiency in depth and breadth of investiga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tc.. Language contact research provides not only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ese dialect contact research, but also case studies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Altai in northern China in contact linguistics. Revising and improving language contact theori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orthwest China; language contact;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Altai language family; Chinese dialect; loan words